孔　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479 年），春秋末年鲁国 陬邑昌平乡阙里（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大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远祖是商代贵族的后裔，但孔子出世时，他的家族已经破落贫贱了。传说他容貌奇特，头顶中间低四周高，身长9.6尺（合今 2.2 米），当时的人们都叫他“长人”。据说他自幼喜欢传统的仪礼制度，和小朋友玩耍时经常摆上几案和食器，演习典礼仪式。他十五岁时就立下了学习的志向，决心学习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但他并不轻视实际工作。他当会计（委吏）时管理帐目很认真；他当管理牛羊的小官（乘田）时工作也很负责。

大约三十几岁时，孔子就开始以讲学为业，他不一定是当时唯一的创办私学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大规模地招收弟子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即招收学生不考虑社会地位，所以他的学生中既有贵族子弟，也有许多贫贱之士。他的学生很多，传说他一共收过三千弟子，其中成就突出的就有七十二人，如子路(仲由)、子贡(端木赐)、子渊(颜回)、子游(言偃)、子夏(卜商)等人成就都比较显著。孔子曾整理了许多上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教授弟子,这就把以前贵族所专有的文化学术传授给了一般平民，打破了贵族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孔子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孔　丘　选自《唐·吴道子画先师孔子行教像碑》

情，鼓励学生闻道济世。他与学生的许多问答都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这就推动了庶人参政，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和教学生涯中，孔子及其弟子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揭开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孔子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一直想寻找机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以贯彻他的政治思想，但他直到50岁才有机会担任鲁国的中都宰，是国都境内的公邑长官。他干得比较出色，很快就被提升为司空(掌管工程),不久又被提升为司寇(掌管司法狱讼)。但是贵族集团的内部矛盾和他们的私利是不允许孔子彻底实施他的政见的。孔子认清这一点以后，就带着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在14年的游历中，他发表了不少政见，但没有受到统治集团的重用，晚年回到鲁国后便把精力完全投入文化教育事业,直至病终。

有关孔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论语》中。《春秋左传》中也记载了孔子的一些言论和事迹。在孔子哲学中，最高范畴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决定者。孔子说过“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论语·子罕》）他这里所说的天似乎是有意志、有智慧的。就此说来，孔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孔子所说的天有时又接近于自然之天,他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所说的天已不同于商、周时期传统观念中发号施令的天。孔子所谓天可以说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渡形态。孔子哲学在许多方面都呈现了这种由旧到新或由消极到积极的过渡形态。比知他信天却怀疑鬼神；重视天命却强调人为；他承认生而知之为上却强调多闻多见；主张尊君却反对独裁。

由于孔子思想并不单纯，加之后人对孔子思想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使得评价孔子的问题变得相当复杂。我们认为孔子学说确有消极保守的方面，如不鼓励改革创新，不重视生产劳动等等，但孔子学说在历史上能产生深远影响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先秦，当统治者还没有有意利用孔学的情况下，孔子学说能广泛流传，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和诸家学说相比，孔子重视文化教育，没有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的偏向；孔子主张积极有为，没有道家的消极情绪；孔子比较重视人民的愿望，没有法家残酷奴役人民的专制主义。经过各家学说的长期竞争，孔学终于获得最广泛最久远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华夏民族共同心理的铸造者，这决不是个别统治者所能主宰的，而是因为孔子学说最有利于华夏文化的发展。当然，对于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和歪曲的孔学还需要另作分析。

一、"己欲立而立人"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是孔子，孔子的人生理想就是"仁"。"仁"的观念包涵内容很广，但基本宗旨却很简明；"仁"的思想境界很高，但又是简易切近的。孔子平时不经常讲"仁"，但由于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重要，所以大部分被收集到《论语》之中。《论语》全书不过一万字，而"仁"字就出现百次以上，可见孔门弟子对孔子的仁学是相当重视的。

孔子的学生经常向孔子请教有关"仁"的问题。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问孔子说，如果有人能够对人民普施恩惠，救济万方，那怎么样？够得上"仁"了吧？孔子说，如果那样就不止是"仁"了，简直达到了"圣"的境界，恐怕尧舜都难以作到。究竟什么是"仁"呢？孔子接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孔　丘　选自《唐·吴道子画先帅孔子行教像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范。

“仁”的基本宗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讲,这就体现了“爱人”的原则。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到仁的内容时,孔子就只告诉他“爱人”二字,即要求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别人的真情实感。然而“仁”又不是无是非、无原则的爱,不是姑息之爱,而是“爱人以德”,所以仁者有时也会恶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对于别人的喜爱、厌恶,都要有一定的准则,这一定的准则就是“礼”。“礼”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范、准则和仪式。孔子讲过“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约束自己才能实现“仁”,也就是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让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规范;“仁德”统帅其他诸德,如“智、勇、恭、宽、信、敏、惠”等,但“仁德”又不同于其他诸德。孔子一再以“仁、智、勇”三者并举,认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还常以“仁”与“知”对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显然孔子认为“仁”高于“智”,但不包含“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崇尚仁德,却不轻视知识与学习,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指出仅有仁德而不注重学习,就会流于愚钝,道德修养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学习与锻炼。孔子既重视道德教育,又强调学习知识;既强调以德育统帅智育,又反对以德育代替智育,这都是很有见地的。

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阐明“仁”的基本内容,强调“仁”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孔子的突出贡献。虽然“仁”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道德观念,但孔子赋予“仁”以新的明

确的道德内涵,使‘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学体系的奠基石。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为什么在当时能吸引那么多人、在后来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呢?

首先这是因为‘仁’的观念境界崇高,而又很容易实行。“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人”是最有道德的人,实现‘仁’便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然而“仁”又没有丝毫的神秘性,实践‘仁”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条件。比如达到‘智’需要一定的天资和学习条件,达到‘圣’更需要特殊的机遇和特殊的才干,而达到‘仁’却只要‘能近取譬’就可以了,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是一般人都不难作到的。所以‘仁’的观念既能倍受推崇,又能为人普遍接受。

其次“仁”的观念兼顾人我两个方面,最有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既不是单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单方面对他人的要求。“仁”一方面要求自立、自达,即自强不息,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又要求‘立人”“达人”,即‘助人为乐,成人之美”既有对自己的勉励和约束,也有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仁’的观念既克制了利己主义,又不同于苦行僧式的利他主义。实行‘仁’不会妨碍每个人的正常发展,不排除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所以一般人都乐于接受‘仁’的观念。

最后,仁的观念包含了‘爱人’的原则,虽然这种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无差别的,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点的有远近亲疏层次的,但也包含了对一般人民的重视。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即是庶民。一般人各有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不可侵犯的,这种对于一般人的独立意志的肯定和重视是有重要意义的。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爱人必然是有阶级性的,对不同阶层的人来说,爱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对统治阶级中的人要恭敬、诚实、勤敏,对劳动人民则要宽容和

慈惠,宽容则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慈惠则容易统治和役使民众,所以‘仁’虽不可能要求消灭剥削和压迫,却要求减轻剥削和压迫,这也是‘仁’的观念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圣经》中有一句话,意思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相通的,这说明孔子所提出的‘仁’的道德观念是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的,与西方国家的道德观念是有一致之处的,但孔子所概括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却更为积极,内容更为丰富,远非《圣经》中的格言所能相比,而且孔子的‘仁’的道德体系不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却能如此广泛地产生影响,这也是值得重视的。

二、“为仁由己”

道德和法律都是维系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工具和手段,而道德和法律的作用方式又是截然不同的。道德维护人际关系的作用是靠人的自觉性,而法律维系社会秩序却是靠外界的强制手段。孔子不仅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伦理学体系,而且揭示了道德观念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这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规范,那么怎样实现‘仁’呢?实现“仁”主要是靠外部条件或强制力量还是靠自身的动力?能不能实践“仁德”决定于自己的能力还是决定于自己的态度?对这些问题孔子都有明确的论述。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说明是否履行‘仁德’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他人。孔子还说过,有谁一旦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践“仁德”而力量不够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许有人愿意行‘仁’而力

不够,但我没有见过。显然孔子认为实行“仁德”与否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认为“仁德”并不是遥远的难以追求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真心希望实践“仁”,“仁德”就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这里孔子并不是在提倡动机论,并不是认为只要有为“仁”的欲望就是“仁”,孔子主张立己亦立人,达己亦达人,这都是强调动机要见之于效果的。孔子之所以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主要是为了指出人人有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一些人不行“仁德”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或没有力量,只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实行“仁德”。“仁德”所要求的不过是因己之所欲,推人之所欲,实行不实行“仁德”不存在能力够不够的问题。这就剥夺了任何不实行“仁德”的借口,强调了人人不可推诿的道德责任。孔子没有一般地讲意志自由,但他充分肯定了人有道德选择的自由,这是正确的。

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又提出“仁者安仁”。他宣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有“仁德”的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安心于“仁”,不会作任何不道德的事,聪明人则能认识到“仁德”有利而行“仁”。智者以“仁”为有“利”,行仁而得利,所以“仁”对人实际是大有益处的。但真正行仁德的人应该超出“利仁”的心理,达到“安仁”的境界,即不计较利害得失而行仁。

“仁者安仁”的说法表明道德行为不应有或不必有外在的目的,当物质利益与道德发生矛盾时应该无条件地放弃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恪守“仁德”。人人都希望获得富贵,但如果不能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得到,则不应接受;人人都厌恶贫贱,但如果不能以合乎道德的方法摆脱,则不应要求摆脱。所以君子即使在一顿饭的时间也从不离开仁德,在仓促匆忙之中也一定要实行仁德,在

颠沛流离之时也一定要遵守仁德(《论语·里仁》)。道德行为与贫富贵贱没有必然的联系，行仁德不必考虑贫富贵贱的得失，而追求富贵、摆脱贫贱的方法却必须合乎道德，道德原则比名利地位更为重要，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便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欲望，更不是提倡禁欲主义，而是强调欲望的实现要自觉地以“仁”为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照此说来，懂得仁德不如爱好仁德，爱好仁德不如以仁德为快乐。孔子认为人不仅应该有关于“仁”的道德意识，而且应该有关于“仁”的道德情感，应该在修养仁德、践履仁德的过程中得到感情的慰藉和快乐，这是“仁者安仁”的最可靠的心理基础。孔子认为，真能行仁，达到“仁”的境界就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快乐，没有恐惧，没有烦闷，这就是“仁者不忧”(《论语·子罕》)；“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仁”人以实践“仁德”为精神归宿，所以能超出眼前的贫富贵贱和利害得失，也就能摆脱一般人的忧虑和烦恼，达到心灵的宁静和恬愉。孔子把为人由己的基础落实到“安仁”、“乐仁”的心理状态上，这就从道德意志与道德情感合而为一的基点上强化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

孔子关于“安仁”、“乐仁”的学说含有关于道德价值的一种重要观点，即认为道德价值是一种内在价值，道德不是追求其他价值的手段。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肯定“仁”是最高的价值。仁者以实行仁德为乐，所以在必要时可以为了“仁”而牺牲个人的生命，这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保持生命的意义，提高生命的价值远比生命时间的延长更为重要，主张为了崇高的道德理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孔子所倡导的这种自我牺

牲精神虽曾被统治阶级、反动势力歪曲利用过，但这种精神本身对于劳动人民、革命力量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至献出生命的。孔子认为道德理想比个人生命更为宝贵、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今天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孔子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伦理学体系，揭示了道德选择中个人意志的决定作用，强调了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这确实反映了孔子的深思睿智。

三、“过犹不及”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事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超过这个标准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这一道理。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颛孙师）与子夏（卜商）两个人谁更好，孔子回答说，子张作事常有些过火，子夏作事常有些不够火候。子贡就又问，那么像子张那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儿呢？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即过分；“不及”即不够，事情作过了头和作不够的效果常常是一样的。比如，不锻炼身体，身体可能虚弱多病，但运动过量，超过身体的负荷能力，又会带来新的疾病，其结果是一样的。又比如发射卫星，火箭速度不够，不能把卫星送至轨道，火箭速度过高，就会超出预定的轨道，两者都不能成功。

既然过分和不足都是不好的，那么怎样才既不过多又不致不足呢？孔子提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中”即适中，既不不够，也不过分；“庸”是运用之意；“中庸”即用“中”，即善于运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的标准，随时做到适中。孔子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当的标准，这就是“中”，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处理事情都要合乎标准，这就是“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和“中庸”意思相近的还有“中行”。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中行”即适中之道；“狂”即急躁冒进，“狷”即拘谨畏缩，贸然而进或畏缩不进都是不好的，最好的还是“中庸”。

中庸有两层意思：第一，肯定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要转向反面；第二，要求恪守这个限度，以免转向反面。这第一层意思显然是合理的、正确的。第二层意思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合理的，因为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历史里，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保持平衡，才能避免走向反面，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则必须打破平衡才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中庸就难以进步了。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在事物相对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中庸”的原则有利于事物的平衡发展，而在事物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庸”的原则就会阻碍事物的发展。“中庸”的方法意味着在事物或情况的复杂序列中，在两极之间的过渡带中寻找一个适当的标准，这是合理的，这里有一个掌握适当的分寸或程度的问题，因而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孔子既讲“中庸”，又讲“毋固”。《论语·子罕》篇中说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主观妄测，反对绝对肯定，反对固执不化，反对自以为是。“中庸”要求遵守一定的标准，“毋必，毋固”则反对不顾一切地拘守某一固定标准。这一方面肯定了适度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一定的灵活性，因而也反映了一定的辩证观念。

四、“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提出了第一个简单的认识论学说。孔子区别了“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认为“生而知之”的人高于“学而知之”的人。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孔子似乎承认了有的人可以不学而知,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谁是“生而知之者”,他断言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只是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认为他自己的知识都是由于爱好古代文化、勤敏学习而获得的,这不是一般的谦词,而是说的真实感受。看来,他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不过是一种假设之词,他并不认为会有什么人真能生而知之。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他反对“不知而作”,说他自己没有那种不懂却凭空妄作的毛病。他的学习包括“多闻”与“多见”两个方面:“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多闻”即选择接受前人已有的知识,属于间接认识;“多见”是积累经验,属于直接的感性认识。孔子肯定了耳目感官之知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有唯物主义倾向。孔子肯定了感性认识,但不以感性认识为最高认识,比感性认识更为重要的就是“一以贯之”。孔子有一次问子贡说:你们认为我是“多学而识”(博闻强记)的人吧?子贡回答:是这样,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对,我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即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理论思维的结果。孔子认为仅仅多闻多见并且记住所闻所见是很不够的,必须经过理性思考从中提炼出概括性的理论把所学的知识贯穿、统帅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一以贯之”高于“多学而识”,但“多学而识”还是基础。孔子自己说过“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多学而识就是“下学”;一以贯之就是“上达”。“下学而上达”也就是由经验上升到理论。“一以贯之”有赖于“多学而识”;“多学而识”有待于“一以贯之”,这也就是说,理论认识有赖于感性经验的基础,而感性经验必须上升为理论知识才能获得新的意义。孔子关于“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的学说,包含了关于经验与理论的关系的见解。

“多学而识”是学;“一以贯之”属于思,孔子兼重学与思两个方面,他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有两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就是说,只知多闻多见的学习,不重视认真思考就会茫然无所获,相反,只知凭空思考而不重视学习也会陷入迷妄。“学”与“思”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学”是基础。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说明没有见闻之知作基础,凭空冥想是没有用的。孔子所说的“学”相当于感性认识的过程,他所说的“思”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的过程,感性认识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决不能脱离感性认识的基础。孔子在2400年前所讲的“学”与“思”的关系,虽然比较简单,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老　子

老子大约生活于春秋末年，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

关于老子的生平，历史文献记载比较简单，而且有一些分歧，但从先秦文献来看，老子即老聃本来是没有疑问的，《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都把老聃当作《老子》一书的作者，有些古籍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司马迁写《史记》时记载了一些不同说法，但他的基本倾向还是认为老子与孔子同时且年长于孔子，孔子确曾向老子请教过。据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老子即老聃，是春秋末年周朝掌管文献典籍的一个史官，著书上下两篇，共五千多字，这就是今天仍在流传的《老子》，也叫《道德经》。今天流传的《老子》中掺有后人的一些文句，但基本上保存了老聃本人的学说。虽然老子年长于孔子，但他的思想著作产生的影响却晚于孔子。

《老子》一书虽然只有五千多字，却包含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在自然观上，老子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产生天地万物并决定着万物的存在发展。在认识论上，老子首倡直觉主义的认识方法，反对一般的感官活动或思维作用，认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主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四十七章》），认为关门闭户，静观体验就可以直接认识世界的根本原理。这种认识论夸大了直觉认识的作用，有神秘主义色彩。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是他提出了丰富



老　聃　选自《明·丁南羽画老子骑牛图》(册页)

的辩证法学说，肯定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提出了如何利用矛盾转化的理论，他的理论学说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传统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社会政治方面，老子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并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七十五章》）。老子还揭露了统治阶级推行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指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老子还提出了落后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向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主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八十章》）。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情绪——一方面是反对剥削压迫的进步性，一方面是狭隘守旧的落后性。

一、“道”为“万物之宗”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特有的概念。道的含义丰富而复杂，不同思想家在不同情况下所说的道含义往往不同。道字的最初意义是道路，后来引申为做事的途径、方法和原则。《论语·述而》篇中说“志于道，据于德”，这个道是指道德原则；《管子·任法》篇中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这个“道”是政治原则；《周易大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又是指基本规律。此外春秋时期也还有“天道”的说法，《春秋左传》即记载子产说过“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天道”即天之道，特指与天象有关的自然规律。

道这一概念的多种意义老子也都使用了，但与此同时，老子赋予了道一个全新的意义，这就是把道当作产生并决定世界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